

走向全面侵华战争之路

——“七·七”事变爆发前日本侵华政策初探

胡 德 坤

一九三七年的“七·七”事变不是偶然发生的,它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推行侵华政策的必然结果,是日本法西斯内外交困、走投无路,对外实行侵略扩张、争夺世界霸权总战略中的重要步骤。毛泽东同志指出:“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事变,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①“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继续变本加厉地推行全面灭亡中国的侵略政策,终于导致了“七·七”事变的爆发,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

野心勃勃 磨刀霍霍

早在一九二七年七月,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中,就制订了征服世界的侵略计划。《田中奏折》明确指出,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这就是说,征服中国是日本称霸世界的第一步。一九三一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强占了我国东北,并不是它侵略的终结,而是新的侵略的开始。“九·一八”事变后,围绕着侵华问题,日本从国际到国内开始了紧张的战争准备。

华盛顿体系的束缚,是日本走向大规模战争、称霸世界的主要国际障碍。众所周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乘欧洲列强忙于厮杀、无暇东顾之机,占领了中国山东,大有独吞独霸中国之势。一次大战结束后,美英利用华盛顿会议,强迫日本交出了在一战中获得的利益,退出了中国的山东,并限制其海军的发展。在华盛顿体系的束缚下,日本被牢牢地捆住了手脚,对此,日本极为不满。一九二七年,《田中奏折》大声疾呼,日本要征服中国,首要的条件是冲破华盛顿体系的束缚,因为“华盛顿会议成立九国条约,我之满蒙特权及利益,概被限制不能自由行动,……此种难关如非极力打开,则我国之存立既不能巩固,国力自无由发展矣。”^②

一九三二年三月,日本拼凑了伪满洲国,企图把东北变成它永久性的殖民地和发动侵略战争的基地。一九三三年二月,国联讨论和通过了李顿调查团报告书。该报告书是绥靖政策的产物,它不敢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和采取任何制裁措施,却又不甘心日本独占中国东北,于是只好宣布不承认伪满洲国。但日本法西斯野心勃勃,力图登上世界霸主的宝座,它希望争霸而不受限制,侵略而不受谴责,连国联这一不痛不痒的指责也不愿接受。同年二月十五日,陆相荒木贞夫在内阁会议上直言不讳地提出:“如果留在国联内,一切都要受到约束,限制了自由。只要退出国联,无论什么事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干。……因此,此时只有决心退出国联,才能有自由的立场,才能开拓自由的天地。”^③二月二十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退出国联,二十七日,日本正式宣告退出国联。

一九三四年九月七日,冈田启介内阁制订了参加伦敦裁军预备会议的方针,提出反对华盛顿条约规定的各国军舰按比率限定吨位的条款,主张各国军舰总吨位一律平等,并退出现

有条约。在同年十月召开的伦敦裁军预备会议上，日本与美国发生冲突，谈判破裂。十二月三日，日本内阁决定单方面废除华盛顿条约，同月二十九日正式通告美国。

退出国联和废除华盛顿条约，是日本对一战后英法美所苦心经营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公开挑战，它把英法美限制日本争霸的种种条约变成了一堆废纸，从而也就最后打破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束缚，排除了走向全面侵华战争的国际障碍。

为了同世界大国抗衡，日本积极对外寻找盟友。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与“有同样利害关系”的纳粹德国签订了《关于共产国际的协定》。这个协定虽然打着反共的旗号，但它实际上既是针对苏联，又是针对美英的，它打着反共的招牌，是实行避免“刺激列国，过早地行使武力”^④方针的结果。日德防共协定的签订，标志着日本摆脱了华盛顿体系之后，又进入了另一个体系——法西斯阵营。从此，欧亚两洲的法西斯国家开始沆瀣一气，遥相呼应，更增加了战争的危险性。

与此同时，日本法西斯在国内，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疯狂地进行着战争准备。

法西斯政权的确立，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前提之一。日本法西斯是依靠战争和推行战争政策上台的。如果说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三年的经济危机，为日本法西斯势力的崛起和膨胀提供了良好的气候条件，那么，“九·一八”事变便为法西斯的上台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

日本法西斯发动“九·一八”事变，强占了我国东北，给危机中的日本经济带来了生机，一九三二年，当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指数下降到最低点时，日本就已开始回升，最早摆脱了危机。到一九三五年，日本对外贸易总额大大超过了一九三一年的23亿日元，达49亿日元，出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首次出超。^⑤日本经济的这种“景气”，是建立在对我国东北侵略的基础之上的，它为日本新老财阀都带来了福音。于是，不仅新财阀，连老财阀也转而支持法西斯的战争政策，成为法西斯的主要社会支柱。财阀的支持，是法西斯上台的决定性因素。“九·一八”事变后到一九三六年的广田弘毅内阁时期，日本法西斯在经过一番与其它政治势力的生死搏斗和内部不同派别的互相倾轧之后，利用军部控制了内阁，再利用内阁实现了自上而下的法西斯化，从而建立了法西斯体制，夺取了政权。法西斯上台就意味着战争的临近，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法西斯政权的确立，必将导致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

随着法西斯的上台和战争政策的推行，日本经济日益军事化，以军事工业为主的重工业得到急剧发展。一九三〇年，日本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占64.5%，重工业占35.5%，轻工业占主导地位。一九三五年，轻重工业的比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轻工业下降到47.3%，重工业则上升到52.7%。^⑥到一九三七年，轻工业进一步减少到42%，重工业激增到58%。^⑦从一九三六年广田内阁起，日本经济已进入准战时体制。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紧扩军备战，军费有增无已。一九三一年，军费为4.55亿日元，占岁出总额的30.9%，一九三七年，增加到12.37亿日元，增加了约二倍，占岁出总额的45.7%^⑧军火工业的发展速度更是惊人。一九三一年，日本陆海军武器生产总额为0.868亿日元，一九三七年上升为7.815亿日元，增长了八倍。^⑨陆海军的兵力也大大增强了，从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七年，日本军队总兵力由45.7万人增加到107.8万人，增加了一倍以上。^⑩

日本经济、军事实力的增长，更助长了法西斯的侵略野心。一九三六年八月七日，广田内阁制订了以苏美英为敌的“国策基准”，规定日本的“根本国策在于国防和外交相配合，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向南方海洋方面发展。”为此，要加强陆军军备，使其“与苏联在远东能使用的兵力相对抗”，在同远东军开战初期，“能给予打击”；要加强海军军备，“使其能足以对抗美国海军，确保西太平洋的制海权。”^⑪把以苏美英为对手，夺取亚洲太平洋地区的霸

权确定为日本的国策，是日本法西斯上台后的第一次，它表明日本在通向战争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总之，“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从国际到国内，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准备，全面侵华战争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

得寸进尺 贪得无厌

法西斯的贪欲是无止境的。当“九·一八”事变正在进行时，日本就已虎视眈眈，觊觎着中国本部，盘算着如何吞掉全中国。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狂妄地宣称，日本应向中国本部扩张，“日本如果不能控制平津地区，占有重要的平绥铁路，并支配北平西北察绥两省四百多公里面积的铁矿区域，将无法安心；而且，除非日本控制了黄河以南的全部中国领土，平津地区就不能安全。”^⑩一九三二年三月，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立即以东北为基地，对中国本部实行蚕食政策。它得寸进尺，步步进逼，在“七·七”事变前的短短五年中，迅速把战火从关外烧到关内，把侵略魔爪从东北伸到华北。

日本扩大侵略的第一个目标是与伪满洲国相邻的热河省。关东军先采取所谓“政治解决”手法，引诱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就任伪满参议府副议长，在遭到汤的拒绝后，便立即要求参謀本部增派一个师团和一个骑兵旅团的兵力，决定用武力夺取热河。

一九三三年二月，关东军开始侵入热河。由于蒋介石政府继续采取不抵抗主义，驻守热河的汤玉麟军不战自溃。三月五日，日军攻占热河省会承德，四月越过长城，攻入河北滦东地区，逼近平津。当日军取得军事成功之后，就立即用外交手段加以巩固。五月三十日，中日谈判在塘沽举行。三十一日，日方代表、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拿出早已印刷好的停战协定草案威胁说，这是关东军的最后方案，不容更改一字，中国代表只能在两小时内作出同意或不同意的答复，这实际上是最后通牒。中方代表熊斌在敌人的嚣张气焰下屈服了，一字不改地接受了日方草案，正式签订了塘沽协定。这个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及热河省的“合法性”，并把河北滦东地区十九个县划为“非武装地带”，它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的产物，是伪满洲国成立后与日本签订的第一个丧权辱国协定。对日本说来，塘沽协定合法地把热河省并入了伪满领土，从而也就使日本越过了通向华北的最后一道屏障。日本利用这一协定，以重兵压迫关内，威逼平津，为它的下一步侵略行动造成了有利的形势。

当日本在热河稳住阵脚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吧侵略目标指向了华北。日本的目的是要实现华北“自治”，把华北从中国分离出来，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企图“以最小的牺牲，收到最大的效果”，^⑪不战而获得华北五省。它的第一步行动是削弱华北的武装力量，胁迫国民政府中央军撤出该地区。

一九三五年五月，日本借口东北抗日义勇军进入了华北非武装地带，和天津两个汉奸报社社长被暗杀，关东军遂以重兵集结于山海关、古北口、锦州一带，随时准备入侵华北。五月二十九日，日本派驻天津的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向北平军事分会委员长何应钦提出，罢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将中央军调出天津和河北，禁止排日等，并公然将装甲车开到河北省主席府前示威。何应钦受蒋介石之命，屈膝退让，完全接受了日方要求，于六月十日作了口头答复：根据中央训令，全部接受日方要求。^⑫这就是何（应钦）梅（津美治郎）协定，它是蒋介石政府签订的又一个丧权辱国协定。

在此前后，日本特务在张家口被中国军队拘留。六月十七日，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以此为契机，命令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向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提出，要二十九军军长

宋哲元陪罪，在察哈尔设立非武装地带，二十九军撤出该区，解散一切排日机关等。面对日本的挑衅，蒋介石政府继续妥协退让，主动解除宋哲元的察哈尔省主席职务，行动院长汪精卫甚至无耻地说：“我们如果受人压迫去做，不如先就自动地去做。”一副投降派嘴脸暴露无遗。六月二十三日，土肥原威胁察哈尔省代主席秦德纯说，如果中方不同意，他就不谈判了，这就意味着要采取军事行动，于是秦德纯全部接受了日方要求，二十七日正式生效。这就是秦（德纯）土（肥原贤二）协定，它同样是一个丧权辱国的协定。

何梅、秦土协定的签订，使华北五省的军事力量大大削弱，成了日军可以任意出入的“真空地带”。于是，日本的第二步行动，就是要把这个“真空地带”变成它的势力范围，将华北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华北国”。

早在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七日，日本内阁通过的《根据国际关系的观察制订的时局处理方针》中就注意到，“在中国本部，地方政权的分立状态日益显著。”^⑮一九三三年五月五日，关东军参谋长在给参谋本部次长、陆军省次官的电报中，就提出了在察哈尔东部“扶植亲日亲满势力”的建议。^⑯同年四、五月份，天津的日本特务机关就策划，鼓动宋哲元、张作相，使其与旧军阀张敬尧合作，用旧军阀的军队在北京发动政变，建立以吴佩孚为首领的亲日政权。^⑰一九三四年，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和日本驻华各地的武官多次密谈，曾设想联合华北各军阀和西南军阀，南北夹击国民党政府，造成中国分裂局面，以分而治之。^⑱何梅协定签订后，沈阳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和张家口日本特务机关长板垣征四郎曾设想，以平津地区的宋哲元为中心，联合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榘，实现华北五省自治。^⑲

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发表声明，公开宣称要把“国民党和蒋政权从华北排除出去，”“把反满抗日分子彻底地驱逐出华北，”实现“华北经济圈的独立（……使华北财政脱离南京政权的管辖）”，和“华北五省的军事合作”，“改变和树立华北政治机构”。^⑳这个声明第一次公开提出了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全面实现“华北自治”的要求，彻底暴露了日本吞并华北的狼子野心。正如当时中国舆论所指出的，多田的声明说明，“日人在最近必完成其囊括华北，侵略西北之计划。”^㉑

十月中旬，关东军把特务头子、号称中国通的土肥原派遣到华北，加紧华北分离计划的实施。当山东的韩复榘和山西的阎锡山拒绝参加五省自治时，土肥原便策划成立以宋哲元为中心，辖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华北协同防共委员会”，预定于十一月二日发布成立宣言，但在中国人民抗日高潮声中，宋哲元不敢同意。土肥原不得已，只得成立了一个以汉奸殷汝耕为头目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这是日本在华北扶植的第一个傀儡政权。它是一个受到全中国人民唾骂、毫无影响的伪政权。该政权的成立，并不意味着日本分离华北的成功，而意味着它的失败。但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却自动成立了一个以宋哲元为委员长的“冀察政务委员会”，管辖河北、察哈尔和平津地区。这是一个既同日本有联系，又同国民党政府有联系的半自治政权。该政权的成立，又给日本分离华北的阴谋提供了新的可乘之机。

在推行分离华北阴谋的同时，日本又把另一只黑手伸进了内蒙。关东军一向重视内蒙，认为它在未来的日苏战争中，是阻止苏联机械化部队从内蒙到天津方面南下的“战略要线”，因此，关东军企图把满洲（东路）、内外蒙古（中路）、新疆（西路）连成一线，筑起一道防苏屏障。^㉒为此，“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一直在内蒙支持亲日派，进行分离内蒙活动。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三日，由关东军一手扶植起来的伪“蒙古军政府”终于成立。

为了达到分离华北的目的，日本极力排斥美英在华势力，切断中国与美英等国的联系。

以便独霸中国。

一九三三年三月，日本退出国联后，美英不甘心由日本独吞在华利益，便给国民党政府一些经济援助，来对抗日本。美国给国民党政府五千美元的棉麦贷款，并签订了中美航空协定，其它西方国家也向中国派出专家，插手中国的交通业。这一动向立即引起了日本的关注。四月十七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对记者发表声明，俨然以中国太上皇自居，声称不准美英支持中国，反对中国“以夷制夷”，利用美英对抗日本。^②天羽声明在中国和美英等国都引起了强烈反响，毛泽东同志曾尖锐地指出：“日本外务省最近的通牒，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强占全中国的最明显的表示，在这通牒上，日本帝国主义明白的确定了中国为日本的保护国，并且直接的提出了日本将以武力保持日本对于中国一切军事、政治和经济的垄断。”^③

一九三五年十月四日，日本外、陆、海三相在《关于对华政策的谅解》中指出，一、必须使中国方面停止排日运动及其依附欧美的政策，并转而采取对日亲善政策；二、必须使之事实上默认“满洲国”的独立；三、必须使之协力排除赤化势力的威胁。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广田三原则”。其目的，就是使国民党政府放弃“依附欧美”的立场，“采取对日亲善政策”，以控制全中国。^④

一九三五年，国民党政府在英国支持下实行币制改革，并宣布加入英磅集团，使日本惊恐不安。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在给广田外相的建议中，认为币制改革“有从根本上破坏帝国的根本方针——即以日本为盟主确立东亚和平的基楚——的危险”，因此要“予以彻底阻止”，要加紧分离华北工作，“使华北各省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完全脱离南京政权而自行独立。”^⑤

尽管日本对美英同中国的接近惶恐不安，总想千方百计地切断和阻挠这种联系，但由于美英在华有着重要利益，使日本的企图没有得逞。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伪满洲国成立以后，日本加紧了对华北的侵略，由于蒋介石政府采取妥协退让政策，到一九三五年，日本分离华北的阴谋有了很大的进展，对日本说来，华北这块肥肉已经在望了，但中国局势的突变，又使日本的美梦成了泡影。

处处碰壁 黔驴技穷

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国民党政府的节节后退，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极大义愤，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一九三五年八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呼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同年十二月九日，在中共地方组织的发动和领导下，北平一万余名学生走上街头，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对华北反共自治”等口号，举行游行示威，虽遭国民党反动军警的毒打，但青年学生没有屈服，坚持斗争，并很快扩展到全国。这就是著名的“一二·九”运动。

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政府，迫使蒋介石不得不转变立场，逐渐趋向抗日。一九三六年七月十日，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拒绝签订承认伪满洲国的协定。尽管国民党政府仍然坚持反共立场，但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及时地把“反蒋抗日”的方针改变为“逼蒋抗日”。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主张联共抗日的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在西安逮捕了蒋介石，逼其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蒋介石被迫接受了联共抗日的主张，这就是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有着重大影响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标志着十年内战的结束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开始。以西安事变为起点，中国共产党又将“逼蒋抗日”的方针改变为“联蒋抗日”了。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中共中央提出了

国共合作的具体建议。同月十五日，国民党三中全会在宋庆龄等左派努力下，终于接受了中共的提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了。

从一九三六年开始的中国政局的重大变化，是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政策的重大打击，从这年开始，日本在华北的侵略活动处处碰壁。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关东军为了在内蒙扩大势力范围，派参谋田中隆吉指挥伪蒙军进犯绥远。伪蒙古军政府头目德王和田中认为，上有日军飞机支援，下有伪蒙军攻打，就可以使傅作义的绥远军不战自退，绥东便垂手可得，然后乘胜西进，不数日就可占领整个绥远。^②十一月十四日，伪蒙军在绥东红格尔图首战绥远军，在全国人民的声援下，傅作义将军指挥绥远军奋起反击，伪蒙军一融即溃，仓惶逃窜。二十三日，伪蒙军与绥远军再战于百灵庙，又遭惨败。十二月初，伪蒙军与绥远军三战于锡拉木伦，失败更惨，连日本顾问小浜大佐也死于乱军之中。

绥远反击战的胜利，是中国军队自伪满洲国成立以后的第一次全胜，它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当绥远反击战的新闻记录片在北平上映时，观众手舞足蹈，抱以暴风雨般的掌声。^③绥远反击战的胜利，打疼了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外交评论家本多熊太郎在一九三七年的一次演讲中就认为，如果不是西安事变发生的话，也许日本就会乘机大举进攻中国，中日全面战争就会从那时开始了。^④

西安事变后出现的全国团结抗战新局面，极大地唤起了驻守华北的二十九军将士的爱国热忱，军长宋哲元也不甘做亡国奴，开始了根本性的立场转变。一九三六年九、十月份，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向宋哲元发出最通牒，逼其成立“华北国”，遭到宋的严词拒绝。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日，宋哲元在天津发表声明，表示“拥护国家统一，推行中央命令，枪口不对内，凡侵占我土地，侮辱我人民，即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一定要打它。”二十五日，宋哲元不顾日方压力，毅然派副军长秦德纯参加国民党三中全会。秦德纯返回天津后，于三月四日公开宣布：“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今后将严格遵守中央政府的政策。”同月十日，宋哲元在北平接见中央社记者时说：“奉行中央政府的命令是我神圣的任务，过去如此，将来亦是如此。”^⑤表明宋哲元已决心抗日。宋哲元立场的根本转变，宣告了日本制造“华北国”阴谋的彻底失败。

随着分离华北阴谋的破产，日本开发华北的经济掠夺计划亦告失败。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活动日益猖獗，引起了国际舆论的谴责。一九三三年日本退出国联后，在国际上陷于孤立。此时，正值三十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时期，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摆脱危机，相互展开了激烈的经济战。日本出口商品主要是棉纺织品，而棉纺织品的世界霸主是英国，于是，日英两国为倾销商品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为了限制日货的进口，英联邦国家纷纷抵制日货。一九三三年四月，印度首先宣布废除印日通商条约，接着，埃及、葡萄牙等国也起而效之。到一九三四年底，竟有四十个国家对日货实行限制。这样，使日本在国际经济战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再加上国内扩军备战的需要，日本垄断资本对攫取华北资源和垄断中国市场的欲望就变得更加强烈了。

日本财阀早就对华北的资源垂涎欲滴。一九三二年八月，满铁调查室长村上敏藏在一次演讲中就露骨地指出：“仅仅是抚顺，就是有10亿吨以上的煤炭，也是不充足的，如果从日本煤炭的前途来考虑，我们必须注意到山西的565亿吨煤炭。”^⑥一九三五年十月，日本一家报纸宣称，开发华北，“仅从经济意义上来看，人口也好，富源也好，都是满洲不能相比的。”^⑦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关东军和中国驻屯军首脑会议决定，“期望建立日满华三国经济集团”，

“第一步的工作是尽可能地做到周密的调查。”^③同年十二月，关东军司令部在《关于华北问题》中指出，“对华北的铁、煤、石油、棉花、盐等资源的开发，使日满华自给自足，”“如果使华北政权从南京政府分离出来，日满华互相依存，便能有效地巩固（日本）在东亚的经济地位。”^④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由满铁出资设立了“兴中公司”，具体订定和实施经济侵略计划。一九三六年十月，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胁迫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签订了全面掠夺华北资源的协定，但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拒绝而告吹。以后日方曾多次威胁宋哲元，都没有结果。一九三七年一月，宋哲元决心抗日以后，日本掠夺华北资源的计划就完全化为了泡影。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由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开创了全国团结抗日的新局面，使日本在华北的一系列的侵略活动，从军事到外交，从政治到经济都遭到了失败。至此，日本帝国主义已经黔驴技穷，无计可施，于是更恼羞成怒，决心用武力侵占中国，

恼羞成怒 挑起战端

早在一九三六年五月，日本不经中方同意，就擅自将中国驻屯军由2,000人增加到5,500人，使中日关系更加恶化。当时担任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的石原莞尔后来回忆说，中国驻屯军的增兵，是导致“七·七”事变的原因，而日军强占丰台，是“七·七”事变的直接原因。^⑤从六月开始，中国驻屯军举行了一系列的军事演习，演习从白天发展到黑夜，从虚弹发展到实弹；在华日本人相继在华北、华中、华南制造事端，气焰嚣张，疯狂已极。面对日军的挑战，中国军民义愤填膺，驻守平津地区的宋哲元第二十九军将士磨拳擦掌，严阵以待，华北的局势已发展到极为严重的关头。

一九三六年八月，日本陆军制订了一九三七年度的对华作战计划，准备用十四个师团的兵力，占领华北、华中、华南地区，妄图一举灭亡中国，^⑥表明日本已经加快了战争的步伐。九月六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中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自去年策动华北独立以来，对于中国的侵略没有一刻停止的，不论它的侵略方式与方法怎样，跟着具体的情况变化而变化，然而它并吞全中国的基本政策，是始终不变的。在华北进兵之后，高唱着‘经济提携’，实际上不过是以经济的侵略与方法巩固已得的阵地，并给新的进攻准备基础。平津与察北的增兵，绥东的进攻，成都、北海、海口、上海、丰台等地的挑衅，表现出日寇的新侵略行动又将开始。”^⑦

一九三七年以后，日本对华政策重点，已改变为以武力征服为主了。一月二十日，参谋本部在《关于对华政策给陆军省的建议》中提出：“不再进行华北分治工作”，要加紧对华的经济侵略，“真的到了不得已时，经过最大的忍耐后，准备给予致命的痛击。”^⑧二月一日，海军军令部的《综合情报》中指出，“应对既定的对华政策再作研究，准备和、战两手，使之万无一失。”^⑨三月上旬，日本驻华使馆武官喜多诚一，中国驻屯军参谋和知鹰二、关东军参谋大桥熊雄在向参谋本部的汇报中提出，“蒋介石政权无论在表面上或实际上，正在坚决抗日的大方针下，加强内部、充实军备、依靠欧美及积极促进南京和华北的一元化，”“日华关系如此恶化，用一般的手段就能够调整好是不可能想象的”，应“在对苏行动之前，首先对华一击，挫伤蒋政权的基础。”^⑩

六月，东京已盛传“七夕的晚上，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一样的事件，”陆军省和参谋本部都相继派人到华北探听情况。^⑪六月五日，陆军教育总监部本部长香月清司中将，在视察东北、华北后所作的报告中提出，“华北形势相当紧迫。因此，中国驻屯军增强兵力很有必要。”^⑫九日，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在给陆军省次官、参谋本部次长的电报中提议：“从准备对苏作战

的观点来观察目前中国的形势，我们相信：如为我武力所许，首先对南京政权加以一击，除去我背后的威胁，此为上策。”^④此时，日本帝国主义正磨刀霍霍，跃跃欲试，华北上空密云欲雨，预示着柳条沟事件将要重演。但这时中日双方的情况与“九·一八”事变时相比，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日方已经过六年的战争准备，具备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实力，它非打不可；国民党政府已放弃不抵抗主义，中国出现了联共抗日的新局面，全国军民同仇敌忾，非抗战不可。在双方互相对峙的情况下，一点小小的火星，也会触发出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一九三七年上半年的国际形势也有利于日本的侵略：英法忙于应付西班牙战争；美国又遭经济危机袭击，陷入国内事务，苏联忙于国内肃反运动，世界大国都无力插手远东问题，给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可乘之机。

古人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侵略的借口是很容易找到的。七月七日夜，驻北平南郊丰台日军在芦沟桥进行以宛平县城为假想目标的演习中，仿佛听到头顶上飞过几发枪弹，又发现一名士兵失踪，就无理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当遭到宛平中国驻军的拒绝后，就立即包围了县城。其实，失踪士兵二十分钟后已归队，但日军仍不罢休。八月凌晨四时，当中日双方代表正在交涉时，得到增援的日军突然向宛平县城发动攻击。驻守宛平的第二十九军吉星文团奋起反击。这本来是一场局部冲突，而自日本增兵华北之后，中日双方亦发生多次冲突，均未扩大为全面战争。在这次冲突中，失踪日军早已归队，已经失去了挑衅的借口，但日军仍向中国军队发动进攻，这显然是蓄意扩大事态。

“七·七”事变的消息传到东京后，日本陆军中央部的扩大派坚决主张乘机给中国一击，用武力迫使国民党政府屈服。陆相杉山元狂妄地宣称：“中国事变一个月就能解决。”^⑤七月八日，参谋本部积极酝酿向中国派兵。九日，陆军省内定了派兵方针。十日，参谋本部决定，从国内派遣三个师团，从关东军抽调二个旅团，从朝鲜日军抽调一个师团到华北。十一日，日本内阁会议一致认为，应乘机彻底打垮中国，^⑥并通过了陆军省的派兵提案。同日晚，日本内阁发表了《关于派兵华北的声明》，声称“政府在本日内阁会议上下了重大决心，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立即增兵华北。”^⑦为了掩盖其侵略行径，将这一战争挑衅行为称为“华北事变”。十二日，日本新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到达天津。十五日，香月制订了先攻平津，再进行保定会战的作战计划。二十八日，香月指挥中国驻屯军和关东军、朝鲜军的增援部队，向驻守平津地区的中国第二十九军发动了攻击，第二十九军仓促应战，伤亡惨重，日军很快占领了平津。八月二十二日，日本国内的增援部队到达华北。三十一日，日本设立了华北方面军。九月，华北方面军在华北发动了全面攻势，迅速将战火燃遍了华北五省。

八月十三日，日本又把战火扩大到了上海。“七·七”事变一爆发，日本海军就预计到战争必然会波及全中国，而把华中、华南划为它的作战范围。七月十六日，日本驻上海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中将，在《对华作战用兵意见书》中提出，“要想以武力打开日中关系的现状，”仅仅在华北攻击中国第二十九军是不行的，还必须使中国政府屈服，“欲置中国于死命，以控制上海和南京为最重要。”^⑧这就是说，日本迟早会在上海动手的。

八月九日，驻上海日本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和一名水兵，驱车闯进虹桥机场无理取闹，与中国保安队发生冲突，大山被击毙。第二天，长谷川以此为借口，擅自增加驻上海兵力。十二日，近卫召开内阁会议，决定派遣两个师团到上海作战。十三日，日本海军陆战队突然袭击上海守军，中国军队奋起反击，将日军层层包围，著名的上海“八·一三”抗战打响了。十五日，日本成立上海派遣军，立即开赴上海作战。同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宣布全国进入战争体制，并把“华北事变”改称“中国事变”。至此，以“七·七”事变为起点，日本帝

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就正式开始了。

“七·七”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发表通电指出：“平津危机！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④ 通电呼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御外侮。十三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发出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与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需的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⑤ 红军开始集中，随时准备奔赴抗日前线。十五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人在庐山同蒋介石进行谈判，蒋介石表示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推动下，二十一日，国民党政府决定建立党政军战时体制。八月二十二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准备开赴山西、河北、山东作战。二十七日，国民党政府设置了大本营，成立了包括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在内的国防最高会议。九月，八路军到达山西抗日前线，立即投入战斗。同月二十二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了中共的共赴国难宣言。二十三日，蒋介石发表了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国共两党合作的谈话。至此，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告正式成立。这时，中国军民正在华北和华中的广阔战线上，同日本侵略者进行着殊死搏斗。于是，以“七·七”事变为起点，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就全面开始了，从而也就在中国开辟了世界上最早的反法西斯战场。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的历史，是日本帝国主义一步一步地走向全面侵华战争之路的历史。今天，当我们重温这段历史时，不应忘记的是，侵略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国家的分裂，民族的不和。“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给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可乘之机。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被迫同意联共抗日，初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已势在必行，无法遏止了，中国人民不得不吞下这颗苦果。“七·七”事变爆发后，由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成立，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忾，英勇抵抗，打破了日军企图在一个月內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迫使日本不得不渐次增加兵力，一步一步地陷入了中国持久战的泥潭而不能自拔，直至最后失败。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抗战，终于打败了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可见，只有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才能使一个民族兴旺发达，敢于抵御外侮，捍卫民族的主权和独立。这是历史给我们提供的宝贵启示。

注释：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横排本第129页。

② 外交学院编：《中国外交史资料选辑》第2册，第243页。

③ 日本历史学会：《太平洋战争史2·日中战争1》，青木书店，1972年版第62页。

④①①⑥ 《现代史资料8·日中战争1》，水蔦书房，1977年版第354、361、444页。

⑤ 宇佐美诚次郎：《侵略满洲》，岩波讲座《日本历史20·现代3》，岩波书店，1963年版第242页。

⑥ 岛恭彦：《战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岩波讲座《日本历史21·现代4》，岩波书店，1963年版第9页。

⑦ 小山弘健、浅田光辉：《日本帝国主义史》第3卷，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109页。

⑧ 山本四郎：《准战时体制》，岩波讲座《日本历史20·近代7》，岩波书店，1981年版第63页。

⑨⑩ 原朗：《战时统制经济的开始》，岩波书店同注⑧书，第249、240页。

⑫ 薛光前等编著：《八年对日抗战中之国民党政府》，第10页。

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86·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1》，朝云新闻社，1975年版第53、78、103、123、127、133页。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 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册，《文书》，原书房，1978年版第294、207、284、303、309、321、366页。

①⑦ 古屋哲夫：《满洲事变爆发后的对华政策》，京都大学人文学报47号，1979年，第241页。

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 秦郁彦：《日中战争史》，原书房，1979年版第14、46、56—57、106—107、123、123、246页。

㉓㉔㉕ 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九·一八”以来国内政治形势的演变》，第43、37、81—82页。

㉖ 卢明辉：《德王蒙古自治始末》上册，第185页。

㉗ 李云汉：《宋哲元与“七·七”抗战》，第180—182页。

㉘㉙㉚ 江口圭一：《日中战争的全面化》，岩波讲座同注㉛书，第133、133、134页。

㉜ 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别卷·资料编》，朝日新闻社，1963年版第256页。

㉝ 《现代史资料12·日中战争4》，水蔺书房，1973年版第412页。又见《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13—16页。

㉞ 朝日新闻法庭记者团：《东京审判》下册，东京审判刊行会，1977年版第612页。

㉟ 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20页。

㊱ 《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水蔺书房，1978年版第186页。

㊲ 魏宏运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第4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第1页。

㊳ 《解放》第1卷第11期，1937年7月15日版。转引自李新等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页。

~~~~~

(上接第42页)

表六

| 年 份         | 产 量     | 产 值         | 利 润      |
|-------------|---------|-------------|----------|
| 1 9 8 0     | 130.14吨 | 185.72 万元   | 5 万元     |
| 1 9 8 1     | 1,240 吨 | 1,034.46 万元 | 90.33 万元 |
| 1 9 8 2 上半年 | 380.67吨 | 680.16 万元   | 30 万元    |

斤加价0.10元；乳粉：除食品工业公司计划供应外，黑龙江可满足供应；炼乳：本市均可保证供应。其它辅助原料，历来可满足需要。

## (二) 具备兴建真空干燥生产线的条件

兴建真空干燥生产线必须具备两个主要条件，一是要有较宽大的厂房，生产线约占面积二千多平方米，该厂地处郊区，厂区面积大有发展余地。二是要有一批较成熟的生产技术力量，三年来，该厂通过固体饮料的生产，已有一定的技术力量，近来又组织人员到上海学习，初步掌握了乳化生产的新工艺，因此，我们认为饮料三厂兴建真空干燥生产线是有条件的。

(三) 通过市场预测，初步了解了全国生产固体饮料的产销和市场情况，其主要趋势如下：

(1) 社会对固体饮料的需求将逐年增长；(2) 固体饮料的销售量将逐年增加；(3) 各地固体饮料生产将迅速发展；(4) 省、市之间、厂际之间的竞争将逐步加剧，成本高、质量低的产品，将逐渐被挤出市场。质量高，花色好的新品种将不断出现。

## 四 结论

根据上述情况，有以下两点结论：(1) 欲提高产品竞争能力，保持原有市场，必须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因此，改革旧的生产工艺，尽快采用新的生产技术，即兴建真空干燥生产线是完全必要的；(2) 如果产品质量能达到部颁标准，定价合理，即不超过或略低于上海同类产品的价格，而且销售策略对头，则兴建真空干燥生产线后，其新产品将受广大消费者的欢迎，并且能广开销路。